

3月26日，在一片爭議聲中選出了香港特區新一任特首，並於7月1日香港回歸二十年當天就任。未來五年，香港的變化值得觀察。6月號將以「香港回歸二十年」組織專輯，敬希垂注，也歡迎惠稿。

——編者

從小地方看大時代

項飆的〈正規化的糾結：北京「浙江村」和中國社會二十年來的變化〉（《二十一世紀》2017年2月號）一文，探討了北京城南一個非正規經濟體「浙江村」向正規化轉型的過程。該文從微觀入手，讓我們看到近二十年來大時代的變遷對小地方產生的影響。同時，項文也暗指「浙江村」的正規化之路反映了中國市場化改革一直受到無處不在的國家意志的影響。

項文提到「浙江村」批發市場的變遷與國家城鎮化戰略密切相關。1990年代後期開始，城鎮化在東部沿海地區高歌猛進，其顯著後果就是城市人口大量增加，導致城鎮土地價格迅速上漲。2003年筆者在北京讀大學時，北五環外的清河小營還有大片農田，不出數年那裏就蓋起別墅和公寓。十來年後，當初售價不過百萬的別墅已賣到一千六百萬，而原來均價才每平米兩三千的公寓竟已漲到六七萬。「浙江村」所在的南三環外在二十年前還屬於北京偏遠落後的城鄉結合部，現在已成為北京城的黃金地段。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地價迅速高漲，使得「浙江村」小作坊式的運作難以維持，不得不讓位給正規化企業。隨着城鎮化的推進，「浙江村」的企業也被淘汰，讓位給政府眼中更高檔次的行業。

此外，與國家政策變動相關聯的是「浙江村」大人物紛紛入黨。2000年，江澤民在廣東首次全面闡述「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提出要擴大黨的群眾基礎並提高黨的社會影響力，這被認為是允許民營企業家入黨的信號。「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提出時，正值中國市場經濟進入高速發展期，大批民營企業家湧現，他們成為一個重要的社會階層。在高度講政治的中國社會，企業家向黨靠攏，不僅可以贏得正式權力授予的「光環」，同時也可以借助這個「光環」與政治高層有更緊密的聯繫，從而為自己的經濟活動提供更多便利。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無論是對中共還是對民營企業家而言都算恰逢其時，以致全國上下掀起民營企業家入黨以及加入各級人大、政協的高潮，而「浙江村」大人物紛紛入黨只是這一現象的縮影。

勵軒 成都
2017.2.12

「身份恐懼」：土改促成的社會觀念

1950年代初期，中國大陸進行了一場暴風驟雨般的土地改革運動。這場土改運動不僅重新分配了鄉村資源，而且顛覆了原有的社會關係，同時塑造出新的權威。以強力方式推動土改，一方面快速、有效地實現了發動者的初衷，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產生了中共黨史稱之為「『左』傾偏向」的現象，引發「自殺」的極端行為便是其中突出的一種。

滿永〈身份的恐懼——安徽省阜陽地區土改中的自殺現象〉（《二十一世紀》2017年2月號）一文，從社會文化視角剖析了地主與農民兩類不同群體的自殺成因。地主是土改的鬥爭對象，如果對他們的自殺行為，尚可解釋為「鬥爭過火」造成其不堪壓力，那麼作為土改依靠對象的農民，尤其是貧、下中農，為何也有人選擇走上這條不歸路？滿文認為，土改通過「劃成份」的方式建立起身份差別制度。在這種有差異身份制度下，地道的農民一旦因某種因素被歸為地主之列，立即面臨被揭發、清算與批鬥的厄運，政治地位與生活待遇隨

之低人一等。人們對此留有深刻印象，進而形成「身份恐懼」的觀念，以致土改結束後依然刻骨銘心，揮之不去。文章提到某農民將土改分來的田地出租，後突聞所謂「二次土改」的傳言，擔心自己也會被貼上「地主」標籤而墜入深淵，在強烈預設前景心理的驅動下驚恐萬分，最終選擇輕生。概言之，無論地主或是農民的自殺行為固然是個體選擇的結果，但與「身份恐懼」帶來的重重壓力有着密切關係。

文章結論提到，對於當時的普通人而言，個人政治身份始終處於變動之中。確切地說，這種身份變動基本都是單向的，即從「成份差」轉化為「成份好」難於上青天，反之則是以湯沃雪，輕而易舉。更令人不安的是，身份轉變的過程中，幹部有着極大的裁斷權。他們高高在上的權威地位，僅憑藉着「劃成份」這種幾近於「定人生死」的權力，已使人恐懼不已。這不禁讓人想起斯大林在《君主論》上有名的批註：「令人恐懼比受人愛戴更偉大。」

黃駿 南京
2017.2.15

女性「覺悟」的運作機制與效果

晚清至民國興起的女權運動，從某種意義上說改變了社會的組織方式和個人的生活方式，但這種結構性調整並非一蹴而就，改變的過程相當複雜。在女權啟蒙向社會展開的過程中，動員主體和接受客體之間，文化精英和普通女性之間往往會發生某些難解的博

弈。黃江軍〈「覺悟」女性的自我書寫：以1930年代的《女子月刊》為中心〉（《二十一世紀》2017年2月號）一文，對婦女運動者喚醒普通女性的啟蒙互動機制，在微觀歷史層面上做出了細緻的研究。

《女子月刊》是繼《婦女雜誌》之後在民國扛起女權大旗的一份重要刊物，1933年創刊不久，據發行者姚名達提供的數據就「至少有二萬讀者」，可見傳播廣泛。《女子月刊》在發刊詞中表示要做天下女性言論的「播音機」，針砭時弊，「喚醒同性」，解放女性自我。這台「播音機」聲音相當洪亮，影響自然巨大。但是，這種巨型話語傳播到女性個體身上的回應不一，知識精英的宏大敘事與普通女性的個人敘事之間生成了一個駁雜的中間地帶，發聲與回應形成多聲部共振，調性難以把握。此種狀況對於知識精英慣常使用的「祥林嫂」式苦難型喚醒機制來說，無疑是一種內在的自我消解。

《女子月刊》的編者與讀者攜手共同創造的女權運作機制，在同構中顯示出異質，意識「覺悟」的程度因人而異，真正能夠使用巨型話語關照自身而「覺悟」的女性只是少數。這種自上而下的「覺悟」模式從晚清開始一直受到啟蒙者青睞，以為能夠立竿見影，輕鬆愉悅地走向光明的前途。其實，普通女性「覺悟」的過程充滿了諸多痛苦，當某個女性對自我的遭遇充滿了怨恨，尤其是被動員之後產生的怨恨，那麼，她感受生命的豐富情感也許就逐漸消失，只剩下單一的仇怨。在失序的狀態下，她將如何開拓「覺悟」後的新生活？難道只有搜集和組織「怨恨」，身陷痛

苦之中，與舊我徹底決裂才能創造新生活？

細究起來，女性個體自述的痛苦與迷茫，並非都來自於制度性的壓制，如黃文所述，「儘管同樣是苦難敘事，但是否歸因於女權主義的解釋卻因人而異」，有的人並未能「自覺」意識到其問題就是動員者提出的所謂「婦女問題」。她們在「覺悟」中產生的苦悶，也可以在別的問題框架中得到合理解釋，謀求化解的方案。

女權運動如果只對「男女平等」、「經濟獨立」、「政治參與」這類巨型話語感興趣，以此判定女性「覺悟」與否、程度如何，無疑會遮蔽很多更具體的問題。當巨型敘事宰制了微觀歷史，對於女性個體的自述式回應就得慎重地「解譯」(translate)，認真辨析普通女性言說歷史的真實性。1933年《女子月刊》組織的主題徵文「過去三年的我」，因而成為一扇窺探女性微觀歷史的小窗口，在話語的碎片中展示了女性個體的千姿百態，檢驗着女權啟蒙的有效性。

《女子月刊》的創辦者姚名達、黃心勉夫婦致力於女權啟蒙，希望喚醒廣大女性，精神值得敬佩。但作為「覺悟」者的黃心勉本人遭遇到未化解的女性生存問題，卻值得深思。她一邊忙於事業，一邊操勞於家庭，頻繁無奈地懷胎生育、長期過度的勞作和疾病快速消耗着她年青的生命，三十三歲即香消玉殞，令人嘆惋。在她身上，「覺悟」是否構成了某種反諷？

畢新偉 阜陽
2017.3.8